

先秦史

翦伯赞著

翦伯赞著

先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写成并问世的一部史学名著，原题《中国史纲》第一卷，这次整理再版，改名《先秦史》。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按照社会发展史的体系，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自原始社会初期至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包括了社会生产、生活、政治制度、重大史事、主要人物以及各个时期的科学文化成就。所用资料有古文献、古人类和古生物资料、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和民俗学资料等。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观点鲜明，文笔生动。本书自出版至今，一直被列为大学历史科重要参考书，亦深受学术界所推重。

## 先 秦 史

翦伯赞 著

责任编辑：何瑞田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昌平精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300千字

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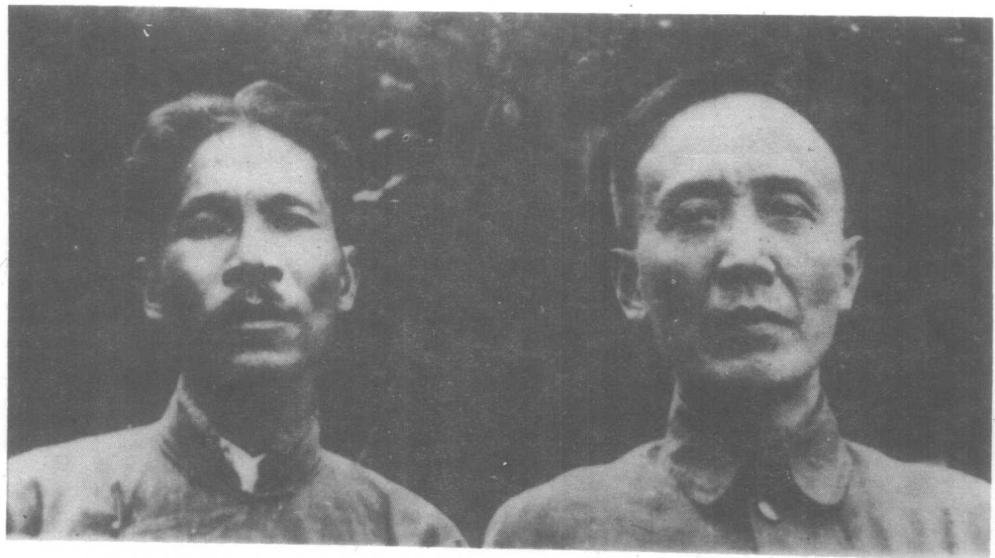
印数：0 001—3,000册

ISBN 7-301-00522-9/K·036

定价：10.05元



翦伯贊同志



抗日战争中期与郭沫若同志合影  
于重庆赖家桥文化工作委员会

# 中國史經

第一卷 史前史 戰國史

翦伯贊著

生活書店發行

《中国史纲》第一卷  
1946年版原封面

(註三六)史記四庫本正義引帝王世紀云：  
周王之子，雖居天子之位號，為諸侯主所得逼，與家人無異名，負債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自其臺辟之，故周人名其基曰避責基。按  
周王雖居天子而實為一愚陋領主，故負債特多。

《中国史纲》第一卷的手迹

他們

於西南山嶺地帶，而這到秦漢時代，便以「西南夷」的名稱，出現於中國的歷史。  
在東南，由於吳越的興起，散布於東南海一帶的百越之族，<sup>的前鋒</sup>越國，遭到了打擊，其餘的  
越之族也<sup>只</sup>在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沿海一帶，保有他們原來的地盤，直到秦漢時代便以東甿閩粵及南  
粵等名稱而出現於中國的歷史。

淮泗魯一帶的殷族，到戰國時代，皆已散為齊楚之民戶。其在渤海以北者，亦漸次形成其自己之  
部落，<sup>到</sup>這到秦漢時代便出現為濱貉扶餘三韓等「東夷」，分布於遼東及朝鮮半島。

關於塔里木盆地諸種族，在春秋戰國時代之歷史活動，史無所紀，但據社會進化的原理推之，在  
這四個半世紀中，這裏的諸種族，亦必有發展。所以<sup>到</sup>秦漢時代便以「西域諸國」有名，<sup>出現於</sup>那  
<sup>時</sup>歷史的奔跑。

最後，說到中原諸種族。此種諸種族，若從縱的方面看，乃是中國境內諸種族在其向中原移徙中  
所沉澱下來的歷史的堆積層。如最古層是「諸夏」之族與「有苗」之族；以後「夏族」與「苗族」層  
上，又堆積一個「殷族層」；更後又在「殷族層」上，堆積一個「羌族（周族）層」。（其中尚有  
屬於有苗族系統之「濮族」的成分）最後在「羌族層」上，又堆積一部分的新的種族層，即「秋族層」  
（即「新的羌族層（戎族）」）。這些種族，一個跟着一個走進中原，或者同時走進中原，即使也有退  
出中原的，但並不是全部的退却，至少有些族類留在中原，這到春秋戰國時代，便構成了很厚的種族

## 校 定 本 序

本书原题《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写于抗日战争中期，即一九四一年“皖南事件”之后。关于当时全国和翦老所在的重庆的政治形势，撰写本书的背景，我在翦著《秦汉史·校定本序》中已做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一九四四年四月，本书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抗战胜利后，上海生活书店又以“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种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九四七年五月两次再版。解放后，北京三联书店又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再版。关于本书的内容，翦老“自序”说：“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这次校定本书，既考虑到本书的内容，亦考虑到《中国史纲》第二卷的校定本已改题《秦汉史》，因之将本校定本改题《先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翦老的名著之一，也是他的力作之一。为撰写本书，他曾较长时期地、比较充分地做了理论和资料两方面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一九三〇年开始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这项准备工作的开始。这次“论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进步知识分子与托派及部分反动知识分子之间、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等问题而开展的一场重大的思想理论斗争。翦老是革命派方面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泼辣的笔锋上阵，连续发表巨型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有《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

划分》<sup>①</sup>、《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sup>②</sup>、《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sup>③</sup>、《“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sup>④</sup>等，共有十余篇，三十多万字。他在论战中所持的基本理论，后来都总结吸收到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出版的名著《历史哲学教程》<sup>⑤</sup>一书中；他在论战中所探讨的主要历史问题，后来亦都总结吸收到本书和其他有关著作中。因此，本书的体例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宏富，理论性强。

本书最主要的特点有四个：

**一、基本观点：**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论述史事、评价人物的。但并不空发议论，做到史料与理论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对于旧的、传统的历史学不是一概扬弃，而是去其糟粕，继承并发扬其精华。关于此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本书的体系是社会发展史的体系：中国传统的史学基本上是信古的，是以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帝王家谱来建立其体系的。内容以称道唐、虞盛世，讴歌圣君贤相为主。

“五四”以后，自资本主义史学兴起，“疑古”思潮发展，曾对传说的史观有所冲击，可是这种史观也是唯心主义的。虽把有关上古的记载归入了“神话”和“传说”，可是从此中国上

① 北平《三民半月刊》五卷六期，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② 共有上、中、下三篇，分别发表于北平《三民半月刊》五卷七、八、十一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十六日、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出版。

③ 南京《劳动季报》第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版。

④ 上海《世界文化》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⑤ 长沙新知书店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桂林新知书店一九三九年八月修正再版。

古的历史就剩下了一张白纸。本书的体系不是这样，而是把从北京猿人出现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这段漫长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用了约二十六万字的篇幅，比较明确具体地概述了这段历史的基本情况，初步揭示了这段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就以上述原始社会为例，他不曾“传神书怪，捕风捉影”，而是把这段历史划分为“前氏族社会”和“氏族社会”两个时期。所谓“前氏族社会”后来多称之为“原始群”或“原始游群”，就是民族学上的“蒙昧时代”，其时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氏族社会”后来多称之为“氏族公社”，就是民族学上的“野蛮时代”，其时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每个时期又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书中对每个阶段的主要生产和生活特点，社会组织和婚姻关系，意识形态，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具体论述。<sup>①</sup>

2. 本书对各个历史阶段的剖析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的：中国传统的史学是以记述制度和事件为主，静止地、孤立地看待问题。本书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论述，都把当时的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既把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分别论述，又把这些方面看作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例如在论述自商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时，都分章论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包括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社会关系，包括了阶级、等级、家庭、家族；政治状况，

① 今天的学术界多将旧石器时代晚期划入母系氏族公社早期阶段；将新石器时代之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划入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等划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包括了制度、事件、重要战争等；意识诸形态，包括了宗教、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有史有论，明确具体。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与“刑”为例，在介绍了“礼”与“刑”产生发展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之后，又指出：“所谓礼者，实即等级制度的教条，亦即封建社会制度之大经大法，所以别贫富，差贵贱，明上下，正身分者也。”“所谓刑者，乃是封建领主对农民行使统治的超经济的强制之权力的表现。”<sup>①</sup>这是用画龙点睛的方法，揭露了当时的“礼”与“刑”的阶级本质。

3. 本书认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中国传统的史学是以历代的“圣君贤相”和“英雄豪杰”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因之，史学著作虽多，几乎每部都是帝王家谱，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碑立传。本书则把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放在主要地位，同时对他们受剥削、受压迫、过着悲惨生活的处境深表同情。如论述商代的奴隶制时指出：“一般自由民则已陷于饥饿线上，而奴隶大众的生活则比牛马不如。”<sup>②</sup>论述春秋时期的封建领主制时指出：“春秋时代的农奴，大部分仍然生活于庄园制经济之中，也有一少部分变成了新兴商人的佃农。但他们都是在繁重的赋役榨取之下，过着饥饿的日子。”<sup>③</sup>书中对奴隶起义，国人暴动，农奴反叛都有较多的论述，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断革命，才使王朝不断更替，制度有所发展、更新。因此，历代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① 见本书 375 页。

② 见本书 236 页。

③ 见本书 368 页。

4. 本书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几千年来一直统治史坛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孤立主义的历史观是不同的。本书在每一重要历史阶段或朝代之前，都有专节论述当时的亚洲和世界形势，比较研究当时的中外社会历史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亦有专节论述当时“中国境内诸种族”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状况，以体现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各族人民是平等的，都是祖国的主人。

**二、主要学术论点：**本书中的重大学术问题是很多的，翦老都有自己的见解，这里不能一一评述。就其中最主要的三个论点介绍如下：

1. 关于采用安特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六个时期”的划分法问题：安特生，瑞典人，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一九一四——一九二五年在中国，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曾在许多地方作过地质调查，又在河南、甘肃、青海等省作过考古发掘。仰韶文化就是他首次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安特生的工作对于中国的考古工作来说，是属于拓荒时期，除了他已发现的有限资料之外，其他能供参考者几乎没有。他当时把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个时期，即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在考古工作中随时进行分类、排队、断代、分期是十分必要的。但安氏这样的分期是否科学，有多大的稳定性，都不是当时可以做出结论来的。在当时，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采用安氏之说是一大进步。翦老说：“安氏的这种划分，至今考古学家尚没有提出新的论证，给予以任何改变。因此，这种划分仍不失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一个标

准。”<sup>①</sup>可是，此后的数十年间，尤其是解放以后，考古工作有极大的发展，地下资料大量出土，新石器文化的类型划分一再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当然安氏之说也就成为旧说而无人采用了。

2. 关于夏代划入“氏族社会”晚期问题：翦老在本书中，把尧、舜、禹的所谓“禅让时代”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把夏代看作是“氏族社会”的没落和向阶级社会转化的时期。所以这样，和文献不足征，考古资料少有关系。在当时的史学界中，不少人对“夏代”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直到解放初期，郭老还说：“唐、虞禅让是原始公社制留下来的史影”，夏代也是“一些史影”。<sup>②</sup>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尤其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发现<sup>③</sup>，夏代作为一个王朝、作为商朝之前的一个奴隶制国家而存在，逐渐为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所承认。翦老在六十年代前期主编《中国史纲要》，就把“夏”列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sup>④</sup>说明至此时，翦老的观点已有改变。

3. 西周封建论：采用“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著书，尤其是撰写先秦史，几乎影响全局。因为这一论点所要解决的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界限在时间上的划分问题，所涉及的朝代不仅仅是西周，而是上起商朝，下迄秦汉，甚至到南北朝，时长约

<sup>①</sup> 见本书79页。

<sup>②</sup>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五月第二版第四六页、十七页。

<sup>③</sup> 二里头文化遗址是一九五九年始发掘的。地层堆积可分四期，第一期遗存的年代与夏纪年相当。

<sup>④</sup>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二章第一节。

两千余年，其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与之有极密切的关系。本书把商朝后期看作是奴隶制度的没落时期，“武王伐纣”与“前徒倒戈”，不仅推翻了商王朝，也最后摧毁了存在一千余年的奴隶制度。西周王朝的建立，也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的时间。翦老把封建制度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西周到战国时期，为封建领主制度，本书题为“初期封建社会”；第二阶段是从秦朝到清朝的鸦片战争以前，为封建地主制度，亦题为“中期封建社会”和“后期封建社会”。翦老早在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即持这一观点，此后数十年间不曾改变，直到去世。“西周封建论”直到今天，还为许多史学家所坚持，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种重要观点，是影响史学界甚大的主要学术派别之一。

三、引用考古资料：本书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中国的古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由于历史久远，文献不足，仅仅以此来说明问题是困难的。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就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sup>①</sup>翦老还是十分珍视这部分文化遗产的。他说：“神话与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换言之，它们都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纪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语言异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sup>②</sup>当然为数也甚少。因此，

① 《史记·三代世表·序》。

② 见本书4页。

翦老决定与慎重使用文献资料的同时，亦大胆地、科学地、充分地利用考古资料。有时还要用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资料。他说：辨伪学的发展，“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金石学的发展，“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商代器物和甲骨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新石器文化之发现，“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猿人化石及旧石器文化之发现，“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本书就是从“中国历史之出发点”述起的。翦老说：“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元为人的历史。”<sup>①</sup>

**四、图文并茂：**翦老的文章之生动，文笔之流畅，很早就为学术界所公认了。我在《秦汉史·校定本序》中曾讲到郭老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写信给翦老说：“十七日信奉到，读后甚感兴奋。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sup>②</sup>这里所说的《中国史纲》是指第一卷，就是本书。当年亦在重庆从事革命工作并熟悉此事的周宗琼同志对我说：“郭老为什么说要‘朗读’《中国史纲》？就是因为写的很生

① 见本书 6 页。

② 《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八期。

动，可以朗朗成诵。”<sup>①</sup>

翦老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在本书中收有猿人化石和古器物图片四十三张，制作了历史地图十二张，各种世系表、大事年表八张。这些图表可给读者增加一些史事的直观性和空间与时间的概念。那时的重庆，图书资料极端缺乏，编制这类的图表极不容易。翦老说：“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sup>②</sup>其艰苦性是可以想见的。可是这样做，既弥补了同类书向来存在的无图无表这一大缺点，又加强了本书的效果。

本书出版之后，在战时重庆的文化界顿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诽谤者有之，赞誉者亦有之；讥讽者有之，推崇者亦有之。总之，在这斗争激烈的漩涡中，不同阶级不同政见的人，对这突然出现的史学巨帙，其反映很不相同。广大进步的青年学生，尤其是一些身陷囹圄而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曾把本书看作是他们的重要精神食粮之一。有时双手捧书，引吭朗诵：“现在，商代的奴隶大众打开了朝歌的大门，他们和西北的革命联军在胜利的呼号中冲进了朝歌。现在，奴隶大众怒吼了，绵羊变成了狮子，牛马变成了人，他们粉碎了他们的锁链，捣毁了他们的土牢，打开了巨桥的谷仓，散发了鹿台的宝藏；并且在神的面前，公然地侮辱了他们的主人。”<sup>③</sup>在这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当前的时代精神融汇为一体，形成了一

① 周宗琼，四川人。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她以一个女青年的身份，在重庆创办国动力酒精厂，自任厂长，用资金支援革命。抗战胜利后，周总理亲自任命她为上海大孚出版公司总经理，坚持在国统区斗争。

② 见本书5—6页。

③ 见本书204页。

股无所畏惧的冲击力量。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吴斯的题为《人的历史，真的历史》一文说：“历史研究不是为了夸耀往日的光荣，更不是为了再造一个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从烟雾中显示出历史的本质，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乃是为了现在的战斗。一部好的历史书应该具有这种用处：告诉读者过去几千年的人的历史，真的历史，并且导引着你从过去想到现在。”<sup>①</sup>作者认为本书已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一九六一年春，翦老受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委托，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一书。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原是采用郭老的战国封建论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在周扬同志的建议下，为更有利于百家争鸣，改用了自己素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并把西周至战国部分改由他亲自执笔。他同时命我对本书做一次全面检查，对所用资料进行校对。这是要我更加熟悉他的观点和所用资料，以便于更好地协助他完成这一写作任务。同时亦为本书的再版做些准备。当时，陈大松先生也做了一些工作。

这次整理，开始于一九八四年，以上次的校订本为基础进行的。由于参加者各有本职工作，比较繁忙，所以整理工作时断时续。可是总的说来，同志们的态度严肃认真，整理工作较全面深入细致，达到了预期的要求。整理本书的原则和整理翦老其它的著作一样，以全面核对资料为主，理论、观点和文风一律不动，以保持原书的面貌。本书还有如下三点需要说明：

一、原始社会分为两大部分（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和关于新石器文化采用了安特生的“六个时期”的说法，都不做

<sup>①</sup> 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新华副刊》。